

7.

## 中国共产党能吸取中国皇帝的教训吗？

王裕华 (Wang Yuhua)

1912年，在毛泽东19岁的时候，他的中学老师给了他一本书，之后成为他的终生所爱。他在长征期间、延安窑洞里和乘火车到全国各地巡视时也读它。在他的床头柜上，总能看到这本书，让他可以在睡前阅读。毛泽东告诉大家他已经将此书读了17遍，而且他经常在与共产党的官员谈话时提到它。

这本书就是《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司马光主编，于1084年发行。这是一本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共有294卷，讲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时任皇帝要司马光编写此书，是为了考究以前历代皇帝的得失，以便将来的皇帝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自己犯错误，从而成为更好的统治者。

毛泽东为何如此迷恋这本于将近1000年前编写的书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已与古老的过去大为不同：经济上实现迅速工业化，国家被赋予更复杂的职能，而且随着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崛起，中国已不再是世界中心的“中央王国”。然而，毛泽东面临的核心挑战却与中国皇帝非常相似：如何维护政权？

今天的中国与它古老的过去更是不同。传统的农业社会已逐渐瓦解，现在住在城市里的人比住在农村的人还要多。中国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帝国，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鄙视的富商，现在可以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受到公众的崇拜。然而，中共的高层官员仍在不停地问自己：如何维护政权？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纵观全世界，自1972年以来，已有67个独裁政权倒台了，其中包括众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非洲的个人独裁者以及苏联的共产党政权。阿拉伯之春期间，一些在位最持久的独裁统治者，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Gaddafi）和埃及的穆巴拉克（Mubarak），都被推翻，然后被杀或被关进监狱。美国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自由民主的兴起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在席卷全球的政权更替“浪潮”中，中国共产党怎样生存下来？其他共产党政权的经验并无太多裨益。古巴和朝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分别由卡斯特罗和金氏两个家族统治，而越南和老挝则试图追循中国的步伐，以市场经济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也许可以效仿毛泽东的智慧，以史为鉴。从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中国已被49个朝代的282位皇帝统治过。这些古代统治者和政权的兴衰，可能会告诉中国共产党，要维护政权，需要做些什么。

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的关键教训是什么？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看《资治通鉴》十七次来吸取这些教训。借助数字化的资料 and 现代统计技术，我们现在可以有系统地研究这些历史统治者的兴衰背后的规律。

通过分析由各种历史和传记资料编制而成、有关朝代和皇帝的数据集，我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四个关键教训。

教训一：没有任何朝代能够永远统治下去。中国的49个

朝代中，各个朝代平均统治七十年，从统治不到一年的桓楚（403-404年）到统治中国289年的唐朝（618-907年），变化极大。假设中国共产党在2019年依然执政，它也将达到70年的平均水平。

教训二：精英叛乱是王朝覆灭的最主要原因。大多数王朝不是被外敌或民众推翻的，而是被旧政权一部分的政治精英所推翻。例如，汉朝（公元前206-公元9年）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参加反秦起义前，在他的家乡沛县担任亭长一职。除了刘邦之外，另一支由两个农民带领的起义部队根本未能进攻到首都。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其开国皇帝李渊是前朝隋政府的地方军政长官。隋朝末年，由农民领导的众多起义军不是被隋朝军队打败，就是被李渊消灭。就连1911年结束中国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也是由一群精英领导的，其中许多人是清政府的地方军事领导人，而不是农民。农民领袖，如汉末的张角、明末的李自成和晚清的洪秀全等，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享有盛誉，却从未夺取过皇位。统计分析揭示了同样的规律：对中国各种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平民百姓，而一直都是政治精英。精英们有更多的资源和知识来动员群众，而且他们也更熟悉政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还知道军营、军械库、粮仓、政府文档、地图和财宝的位置。尽管对于从未进过城的造反农民来说，都城就像是个迷宫，但政治精英却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通往皇帝寝宫的道路。刘邦的主要谋士之一萧何，曾经担任沛县县吏，在刘邦大军攻入都城后，立刻就设法攫取秦宫里面的所有地图。

教训三：只有半数的皇帝以正常方式结束统治。表7.1显示了282位中国皇帝的下场。虽然有一半的皇帝是寿终正寝的，但另一半则全都是非自然方式结束统治。非自然的结束统治方式中，约有一半是被精英废黜（谋杀、推翻、被迫退位或被迫自杀）。其次就是在内战中死亡或被废，只有极少数的皇帝（七位）是在对外战争中被废黜或死亡。造成统治者下台的原因与王朝崩溃的原因相似：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权内部，而不是社会

或外国。

教训四：指定了能干且忠诚的继承人的皇帝会活得更长。282位中国皇帝中，有130位（46%）指定了继位的储君，超过一半的皇帝在其在位的前五年就这样做了。由于中国古代的皇室婚姻没有宗教限制，皇帝可以从大量男性后嗣中选择继承人，因此被选中的儿子通常是最有能力，而不是最年长的。我的统

表7.1 中国皇帝的结束统治情况（公元前221–1911年）

原因	结束统治方式	人数	百分比
健康	自然死亡	152	53.9
政治精英	被政治精英谋杀	34	12.06
	被政治精英废黜	24	8.51
	被政治精英强迫退位	17	6.03
	被政治精英强迫自杀	1	0.35
	小计	76	26.95
内战	在内战中被废黜	20	7.09
	在内战中死亡	10	3.55
	在内部威胁下被迫退位	1	0.35
	在内战中自杀	1	0.35
	小计	32	11.34
对外战争	在对外战争中自杀	4	1.42
	在外部威胁下被迫退位	3	1.06
	小计	7	2.48
家庭	被儿子谋杀	5	1.77
	被妃嫔谋杀	1	0.35
	小计	6	2.12
其他	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中毒	4	1.42
	自愿退位	4	1.42
	意外事故	1	0.35
	小计	9	3.19
	总计	282	100

计分析显示，指定了继承人的皇帝被废黜的可能性比没有指定继承人的皇帝低64%。

那些没有指定储君的皇帝，不是没有儿子，就是要依循其他继承规则。例如，蒙古人依循幼子继承制（按照王族成员资历的原则）和选举来选择新的领袖——大汗。结果，蒙古皇帝中只有33.33%是其前任的儿子，而蒙古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是10.8年，远短于下一个朝代明朝的汉族皇帝的17.8年。

为什么指定继承人对皇帝有益？正如经济学家杜洛克（Gordon Tullock）所言，任命继任人的好处在于，政治精英可以开始规划自己的策略，并认定他们在继任者的统治下，会比在当前独裁者的统治下，度过更长的人生。然而，任命继承人也有风险。正如杜洛克所指，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他正式指定了一名继任人，就会令继任人产生弑君的强烈动机，但同时又有合理的保障，使继任人可以逍遥法外。这通常被称为“储君问题”，而毛泽东在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试图炸毁他的火车时，就受到沉重的教训。因此，杜洛克认为，世袭继承可以在统治者在位期间和以后时间里提供政权稳定性，因为儿子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待父亲去世。

这四个教训当然不是我们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中能够吸取的仅有教益。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自然灾害、如何纾缓贫困，以及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它们却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见解，有助解答如何维护政权的问题。

首先，政权持久性面临的巨大挑战既不是外敌，也不是民众，而是政权内部的精英。政治精英既有知识又有资源来组织反对统治者的政变。甚至在所谓的群众起义中，精英们也常常在动员群众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在对外国影响和群众抗议活动心存猜疑的同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权目前却总想着实行反贪腐运动，令一众政治精英躁动不安。

其次，继承问题极为重要。尽管现代的独裁者很难将自己的统治权传给儿子（朝鲜的金氏家族例外），但对现任领导人来说，选择一个既忠诚（这样他就能够耐心等待）又有能力（这样才能争取政治精英的支持）的继任者，仍是至关重要的。1970年代中国政坛之所以经历动荡，就是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一位不忠诚的接班人（林彪），以及其后一位无能的接班人（华国锋）。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处理了继承问题。邓小平被认为选择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和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而江泽民似乎在选择习近平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谁将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他对继任问题的处理，将是中国未来十至十五年的政治面貌的有效指标。

毛泽东在他73岁生日那天，召集了一些最亲密的盟友会面，告诉他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没有一个可以接班儿子，在继承问题上举步维艰，但他显然通过研读《资治通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身边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同样的教训吗？